

读者反应：清末民初小说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

孙 超

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小说界的阅读文化由单调启蒙转变为多元兴味。清末小说编创者的读者意识明显加强，但其对读者的态度却总以居高临下的启发蒙昧为主导。民初各阶层读者与编创者积极互动，为小说“兴味化”潮流推波助澜。他们将清末重视名家名作名刊的观念上升为核心关切，在热烈谈论中抒发对民初小说繁荣的赞美。他们将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暴露出来，既高度肯定它的积极推动作用，也强烈批评过度市场化带来的诸多危害。这些读者反应不仅关系到当时小说作家作品报刊的声名，亦影响到某些小说类型的兴衰及小说创作观念、小说语体与文体的变迁，是清末民初小说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 清末民初 小说变革 读者反应

随着近代小说研究不断深入，“读者”议题日益引起学界关注。不过现有成果大多探讨近代小说读者构成、编创者的读者意识及其影响等^①，对读者反应这一清末民初小说变革的重要维度尚缺乏探讨。这就导致近代小说读者研究中本该是最生动直观的部分被遮蔽。基于此，本文拟对读者在清末民初小说界阅读文化转变中的具体反应展开系统考察，以期揭示这些反应对于中国小说现代走向深刻且微妙的影响。

一 由单调启蒙到多元兴味

中国小说由不登大雅之堂到“为文学之最上乘”^②，是清末“小说界革命”以后逐渐变为现实的事。这一事实的形成既基于“新小说”理念之倡导和作者著译之实绩，亦有赖于读者的购买、阅读和接受。

作为清末维新派从事宣传的核心人物，梁启超对当时的报刊界和文学界都非常熟悉。他倡导“小说界革命”，乃是意识到“人之好读小说，过于他书”，意欲“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③。他创办《新小说》，则是想发挥报刊传播广泛快捷之长。从此，清末小说界迅速形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现代文言小说叙录及文体研究（1902—1949）”（项目编号22BZW121）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袁进《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徐振燕《试析〈绣像小说〉的读者定位》，《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4期；潘桂林《中国近代小说读者意识浅探》，《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陈才训《论读者对晚清民初翻译小说文本形态的潜在影响》，《文艺研究》2014年第2期；端传妹《论〈小说月报〉（1910—1931）对读者群体的培养》，《文教资料》2015年第22期；庄逸云《清末民初的小说读者及其对语体的选择》，《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年第1号，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11.14）。

③ 新小说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902.8.18）。

成了以新兴报刊为载体、以新民救国为主调的阅读文化，其突出表现是强调读者应阅读与改良社会有直接关系的“新小说”。清末十年间，从《新小说》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到《绣像小说》指出“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樽桑崛起，推波助澜”^①；从《新新小说》将梁氏“欲新社会，必先新小说”推进为“小说新新无已，社会之变革无已”^②，到《新世界小说社报》宣称“过去之世界，以小说挽留之；现在之世界，以小说发表之；未来之世界，以小说唤起之”^③，当时主流报刊无不以刊载“新小说”招徕读者。“新小说”的著译在这种文学救国的时代氛围中，借助正在崛起的新闻出版业的力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正如吴趸人所感慨，“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④。不过，从拥有读者的实际情况看，清末读者对“新小说”还存在着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如公奴《金陵卖书记》所说，在“新小说”出现之初，因其“开口便见喉咙”“于小说体裁多不合”而销售不良^⑤。在“新小说”发展了几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据徐念慈1908年统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⑥。这一统计显示出“新小说”的阅读主体是趋新的士大夫阶层。对此，袁进有过详细考察，他指出：“从1900年到1912年，又是士大夫大批移居上海的时期，先是庚子事变，后是辛亥革命，上海的租界成为士大夫避难的庇护所，从而扩大了小说市场。”^⑦这种阅读主体比较单一的情况实际是由清末小说界过分强调政治启蒙的单调阅读文化造成的。

至民初，上海现代文化市场进一步成熟，要求小说作家兼顾“市场法则”与“艺术法则”。在补“新小说”寡味少趣之弊，纠时下小说卑劣浮薄之偏的过程中，民初小说界形成了小说“兴味化”主潮，以满足读者的多元兴味为著译宗旨，从而使读者范围空前扩大。居住在上海及其周边城市的那些正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士大夫文人，在此时已变成读写“兴味化小说”的主导力量。他们编辑报刊、撰译小说，将目标读者由本阶层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如《小说月报》1912年第3卷第7期曾刊登《本社特别广告》，将目标读者定位在士大夫文人、新兴市民及学生等阶层，“故能雅驯而不艰深，浅显而不俚俗。可供公暇遣兴之需，亦资课余补助之用”。《礼拜六》则将目标读者锁定为从事于各类职业的传统文人及市民阶层，声明之所以将刊物命名为“礼拜六”，是因他们“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暇读小说也”^⑧。《眉语》在将目标读者定位为“雅人韵士”的同时，着意强调为才媛服务^⑨。《〈小说画报〉例言》宣称“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⑩，大有供当时所有阶层阅读之意。从现存史料看，民初小说的实际读者主要是正在市民化的士大夫文人、新兴都市市民（各类职员、产业工人、商人、医生、律师、教师及其家属等）、各类学生，此外还包括其他各阶层。“新文学革命”兴起后，一批热爱“新文学”的读者逐渐分化出去。不过，由于“新文艺小说”过于欧化，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种分化还非常有限，用瞿秋白的话说，读者“几乎完全只

① 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第1期，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1903.5.27）。

② 侠民《〈新新小说〉叙例》，《大陆》第2年第5号，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7.3）。

③ 《〈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词》，《新世界小说社报》第1期，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1906.7.16）。

④ 吴趸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1年第1号，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906.11.1）。

⑤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卷，第65页。

⑥ 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10期，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

⑦ 袁进《从传统到现代——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304页。

⑧ 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1914年第1期。

⑨ 《〈眉语〉宣言》，《眉语》1914年第1卷第1号。

⑩ 《〈小说画报〉例言》，《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

限于新式知识阶级——欧化的知识阶级”^①。

民初报人小说家身处传统文化解构、各种文化混杂、中西思想交锋、政局十分混乱的时代语境中，所面对的读者的思想、文化及政治立场都非常复杂。要想最大范围地占领市场，主张“以兴味为主”^②的确是一种上佳策略。毕竟一篇小说首先要能引起读者兴味，才能让读者进入实际阅读过程，否则根本谈不上获得什么思想、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教益。实际上，读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阅读小说，都有娱乐消闲、情感宣疏以及文学审美的需要，民初小说家针对这些需要而主倡兴味，自然能够抓住最广大的读者。翻检民初主要的小说报刊，其发刊词、广告语、编后记等无不彰显以读者为本位的“兴味化”编刊宗旨，例如《民权素》创刊号“第二集出版预告”里赫然用大字印着“文学的、美术的、滑稽的”^③；《〈礼拜六〉出版赘言》宣称“晴曦照窗，花香入座；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小说大观〉例言》宣布“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凡枯燥无味及冗长拖沓者皆不采”^④；《星期》为增强读者兴味专设“谈话会”一栏，其缘起中说“必吸引阅者之意思，为之发表于杂志，则阅者之兴味浓厚，而杂志之价值增高”^⑤。在民初小说报刊上，与这些力倡兴味主张相配套的是发挥小说的通俗教育功能、文言白话兼用、撰著翻译并重以及雅俗共赏等主流表述。这便形成了多元开放的编创旨趣，从而改变了清末“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为“群治”“国家”“思想启蒙”服务的单一色调，与各阶层读者共同打造出了一种注重娱情审美、寓教于乐，关注“个体”“家庭”“生活启蒙”的阅读文化。

二 读者—编者—作者的互动转换

在清末小说界强调政治启蒙的阅读文化中，小说编创者的读者意识虽明显加强，但其对读者的态度却总以居高临下的启发蒙昧为主导。例如，梁启超认定“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于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⑥，“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严复、夏曾佑指出，“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⑦。康有为强调：“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⑧在“新小说”倡导者这一编创宗旨的指引下，清末读者始终处于被教化的地位。与“小说界革命”相伴生的清末“白话文运动”、小说专刊以及各类小说作品所设定的假想读者均以知识水平较低、西方政治文明未开化者为主要对象。因此，“白话（读者），是普遍中下社会，如孺孩童”^⑨、“藉思开化夫下愚”（《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新译小说者不可不以风俗改良为责任”^⑩这一类话语充斥于清末小说界。然而，这种读者定位显然脱离现实，“新小说”的阅读主体实际是趋新的士大夫夫人阶层。于是，在“新小说”招牌不变的前提下，一些小说编创者开始关注读者的阅读口味，强调编创小说应该雅俗共

①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3册，第629页。

②④ 《〈小说大观〉例言》，《小说大观》1915年第1集。

③ 《第二集出版预告》，《民权素》1914年第1期。

⑤ 倚虹《〈星期谈话会〉缘起》，《星期》1922年第1期。

⑥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序》，《时务报》第41册，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1897.11.5）。

⑦ 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27页。

⑧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29页。

⑨ 平敏《论白话报不可太无价值》，《群强报》1913年3月25日。

⑩ 戢翼翬《俄国情史》“绪言”，大宣书局1903年版，第2页。

赏，兼顾“有益”与“有味”，着重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上做文章，以凸显小说的文学审美性。略举数例，《北京新报》标榜“体裁明显，有益人心，识字多的看了不厌，识字少的看了明白”^①；《〈时报〉“小说栏”发刊辞》声称“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②；吴趸人相信可以“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朋小说〉序》）；黄人揭示小说实质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③，徐念慈也凸显小说的审美特质，称其为“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④。如此一来，至辛亥革命前夕，追求小说“兴味”慢慢成为小说界的一种独立声音，读者反应才真正被重视起来。

进入民国，读者对富有兴味的新出小说普遍欢迎，上至士大夫文人阶层，下至城市底层民众，纷纷购阅。小说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的重要谈资，接受通俗教育的重要渠道，文化商品消费的重要部分。较之清末，民初小说界的特殊之处是编创者摆脱了那种自上而下的启蒙心态，他们对读者阅读反应的关注体现为一种平等交流。他们主持的报刊上常常设置与读者互动的专栏，发表分享阅读感受的小说话，刊登与读者之间的往复信函。这些材料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当时读者比较真实的阅读反应。

早在小说“兴味化”潮流初起的清民之交，包天笑与陈景韩在创刊《妇女时报》时就声明拟设置“读者俱乐部”栏目，希望“与爱读诸君相切磋”（《妇女时报》1911年第1期）；在推出两期后，改设“妇女谈话会”，又连刊多期。这两个栏目开启了民初报刊编创者与读者频繁互动的时风。此后，王钝根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推出了“自由谈话会”专栏。该栏目从1912年10月23日始，持续到1914年9月29日止，为《申报·自由谈》赢得广大读者的同时，还进一步形成了编创者与读者互动研讨的现代都市阅读场域。1918年王蕴章重新主持《小说月报》时，为“鼓励小说家之兴会，增进阅者诸君之趣味”，从第9卷第4号开始设立“小说俱乐部”，这一举措有效地加强了编创者与读者的互动，培养了一批忠实读者。进入20世纪20年代，在新的办报热潮中涌现出的《半月》《星期》《小说日报》等刊物也纷纷开设这类栏目，吸引读者参与，在满足读者兴味的同时也积极引导他们的阅读品味，从而形成忠实的读者群。下面，我们通过考察《星期》所设“星期谈话会”来进一步认识读者与编创者的互动转换。

《星期》一共出刊50期，“星期谈话会”从第1期开设一直持续到第31期，是同类栏目中的佼佼者。编者设置该栏目的核心意图是让读者产生这是自家刊物的意识。由于该栏目声明“阅者如有所闻见，有所感想，咸可于是栏发表。文字不必长，每条百余字，或数十字足矣”（《〈星期谈话会〉缘起》），这就让读者有话可说，仿佛是开了一个纸上聊天室。从撰稿者来看，除主持“谈话会”的毕倚虹及马二（冯叔鸾）、（蒋）吟秋等少数人是成名作家外，诸如静年、圣劳、春雪等多数是普通读者。该栏目内容五花八门，有的对时事热点发表看法，有的谈论各种生活知识，有的闲谈各界趣闻消息，有的记录一己日常悲欣。这类杂谈虽然琐碎，但大大激发了读者购阅《星期》的热情。

当然，“星期谈话会”中对于了解当时读者反应最有价值的是闲谈小说的小说话。在这些小说话中，有读者向作者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如，品品忠告小说家要“对于近来的社会思潮，世界近状，见识见识”（1922年第7期）；天聪指出作社会小说要亲历亲闻，否则便会失真（1922年第3期）；圣劳则认为写下流社会的小说只能偶用下流社会的口吻（1922年第10期）。有的读者表达了对《星期》及所刊作品的赞赏，如梦兰说：“星期日由礼拜堂出，每苦无事消遣。《星期》既出，可以把晤，而不复叹作么生矣。”（1922年第6期）羽白评卓呆《老牧师》说：“命意高超。此君另有一种冷隽笔墨，淡

① 朱芷沅《祝〈北京新报〉三周年词》，《北京新报》1912年2月8日。

② 《〈时报〉“小说栏”发刊辞》，《时报》清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1904.6.12）。

③ 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1期，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

④ 觉我《〈小说林〉缘起》，《小说林》第1期，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

淡数语，蓄意无穷，颇不落一般文人窠臼。”（1922年第5期）对于编辑部和卖文者，读者们也有话要说，比如拈花谈编者看到投稿中的坏小说和好小说，肯定会有苦乐两重天的感觉（1922年第6期）；天聪直斥按字计酬的资本主义将小说家逼成了小说佣（1922年第11期）。针对“新文学家”的一些激烈言论，不少读者也表达了反感。对于当时中外小说界的其他情况，这些小说话也有零星反映，如无虚谈到《自由谈·小说特刊》吴灵园所辑“诗的小说”深契其心（1922年第7期）；玄华对《佛学丛刊》停刊导致小说《串珠记》连载中止感到遗憾（1922年第4期）；无净认为当时自著的侦探小说很少，而译作良莠不齐（1922年第28期），等等。整体来看，上述小说话发挥了资闲谈的文类优势，虽三言两语不够深入，却能为了解当时读者真实反应提供珍贵一手资料。

小说话是民初读者与编创者进行互动转换的主要文类，作者以报人小说家为主。他们既是所主持报刊的编者、作者，又是他家报刊和作品的读者，因此常常转换不同身份撰写小说话。正如马二先生所说：“我虽然也是著作者中的一份子，同时也是读者中的一份子。”^①于是他就以小说话的形式发表《一个小说读者的意见》，请求作者和编者据其意见实行改革。民初一般读者也喜欢通过这种闲谈方式来表达阅读感受和对小说界的看法，有时还因受了报人小说家所谈话题的吸引而参与讨论，从而形成互动。

当民初报人小说家通过报刊发刊词、宣言、例言、广告等号召打造多元兴味的阅读文化时，从读者角度闲谈的小说话也充当了“同盟军”。这些小说话同样强调小说的审美性、趣味性和“小说性质”^②。例如，云衢《小说谭》说：“爱看报的主儿，差不多的，都爱看小说，并且看小说，比那看演说、看时评、看新闻的兴味，还要浓厚。……作小说的人，再作得有趣味、有意致，更得要引人入胜了。”^③这便很直接地反映出当时读者看报最爱看小说，看小说是为了获得消遣和审美的普遍心理。这与当时报人小说家力倡小说“兴味化”的主张正相吻合。这篇小说话同时强调“小说于世道人心、风俗教化，大有关系”，“不可单把他当个游戏物、娱乐品”，否则“那流弊就大了”^④。这也与报人小说家强调小说应“有益于社会、有功于道德”^⑤一样。孙绮芬《小说闲话》则从读者接受角度谈到作小说应有“小说之精神”“文学之兴趣”^⑥，惟其如此，才能“有兴味而能动人”^⑦，或“读之为浮一大白”，或“令人不忍能卒读，又不忍不读”^⑧。从上述小说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初读者与编创者一样追求小说“兴味化”，三者声音共同汇成了主倡“兴味”的时代强音。

由于民初小说话的首发载体是报刊，往往对报刊上登载的小说及相关作者、编者展开即时评论。如关于“倡门小说”的讨论，求幸福斋主人与马二先生在《晶报》上以小说话形式展开唇枪舌剑。先是马二先生《嫖学著作底大流行》质疑“倡门小说”的价值和效果。而后求幸福斋主人因不满于他的讽刺和否定而撰《论嫖学著作》，不仅强调“倡门小说”的存在有其必要性，还讽刺马二先生也是“倡门小说家”。接着，二人又分别写了《与海鸣论嫖学著作》和《嫖著之余波》互相辩难^⑨。这番对特定题材小说的辩论在当时必定招徕更多读者的关注，也有助于廓清一些创作上的具体问题。又如《最小》上刊登的风云女士、无虚生与江红蕉的几篇小说话，是读者与作者针对具体作品的来往论难。先是风云女士撰《读〈家庭〉杂志有疑》，指出《家庭》主编江红蕉的小说《嫁后光阴》中出现的时

① 马二先生《一个小说读者的意见》，《晶报》1922年6月3日。

② 了磨所谓小说性质是指小说“其境也真，其情也挚，最足以动人心志，启人智慧而发人之深省”（了磨《说小说》，《游戏杂志》1913年第6期）。

③④ 云衢《小说谭》，《群强报》1914年11月16日。

⑤ 天笑生《〈小说大观〉宣言短引》，《小说大观》1915年第1集。

⑥⑧ 孙绮芬《小说闲话》，《新世界》1920年11月18日。

⑦ 孙绮芬《小说闲话》，《新世界》1920年11月21日。

⑨ 以上小说话刊登在《晶报》1922年7月18日、7月27日、7月30日、8月3日。

间错误；而后是红蕉撰《答风云女士》加以解释，而风云对此回答并不满意而撰《越加怀疑》；最后由无虚生撰《我谈家庭杂志》做出裁决，指出红蕉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有失坦诚，并进一步就《嫁后光阴》第二回中出现的情节差误进行商榷^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读者与编创者的频繁互动，听到读者最具现场感的声音。

恽铁樵在《小说月报》设立“本社函件最录”栏目，是近代小说界最有名的编读通信事件之一。该栏目从《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3号始至1916年第7卷第3号止，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从栏目说明来看，当时有读者为改良《小说月报》来信建言，编者乘机设置此栏目以吸引更多读者参与刊物建设的讨论。

恽铁樵接编《小说月报》后崇尚“雅正”，减少了消闲和言情之作，这引起了一些读者的不满。陈光辉来信指出恽氏改革“意弥苦矣，不知其大谬也。……盖观者之心理，本以消闲助兴为主……凡百小说，以有兴味而用意正当者为上，其余均不足取也”^②。许与澄则在信中直接批评恽氏改革“致令程度浅薄者，阅之索然无味”。他建议，“宜增设狭义的言情小说也。……宜创设别体之言情小说，务在救正流行诸本之弊”；“宜注重国学的科学小说也。……要以滑稽为主，不如此则不能引人兴味也”；“宜增设滑稽史也”^③。也有读者在批评第6卷较第5卷“减人兴致多矣”的同时，要求将令英雄气短的言情小说一律除去^④。从中可见当时读者对小说助兴味、供消闲的宗旨一致拥护，但对言情小说的态度则分歧严重。恽铁樵面对读者上述的尖锐批评和不同意见，给予了谨慎、坦诚的答复。他一面坚持认为“小说对于社会有直接之关系，对于国家有间接之关系”^⑤，因此当使小说成为永久之书，而非一点钟之书^⑥；一面也表明对小说“兴味”的认同，同意读者所谓“浇漓之俗难与庄论，宜先之以诱导；小说非讲学，最忌头巾气”^⑦。不过，对于有读者提出增加言情小说的建议，恽铁樵显然不能赞同。他之所以减少刊登言情小说，是因当时言情小说低俗泛滥，他要大张异帜，遏制这股潮流。职是之故，恽铁樵对读者所说“爱情小说所以不为识者所欢迎，因出版太多，陈陈相因，遂无足观也”^⑧“今青年子弟，多半误于不良小说。学校百日教修身，不敌言情小说数百字”^⑨等观点大加赞赏，并在与读者的通信中多次批评市面上流行的“骈体”言情小说。除此之外，有些读者对《小说月报》以文字高古为尚也发表了异议，以当时世人公认的“小说为通俗教育之一”为据，提出好小说不应以文字是否高古为标准，甚至有人还提出了小说应言文一致（参见《陈光辉君来函》《复陈光辉君函》等）。恽铁樵对这些意见也很重视，一面对小说语言应具通俗性表示认可，一面表示“今日骤强言文一致必不可。盖凡事蝉蜕，循自然之趋势”^⑩。他之所以有此判断，固然基于其古文家立场，也是基于当时读者主体之实际——阅读《小说月报》的主要是“林下诸公”“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男女学校青年”，而非“商界农界读者”^⑪。恽铁樵虽然最终还是坚持使用隽雅有味的文言，但也部分地听从了读者意见，拟将《小说月报》的语言变得“稍浅易”以争取更多读者（参见《答某

① 以上小说话刊登在《最小》1923年第1卷第21、24号，1923年第2卷第40号。

② 陈光辉《陈光辉君来函》，《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1号。

③ 许与澄《节录许与澄先生来函》，《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12号。

④ 翰甫《翰甫君致本社记者书》，《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5号。

⑤ 树钰《答翰甫君》，《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5号。

⑥ 铁樵《编辑余谈》，《小说月报》1914年第5卷第1号。

⑦ 树钰《再答某君书》，《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3号。

⑧ 铁樵《答刘幼新论言情小说书》，《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4号。

⑨ 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7号。

⑩ 树钰《复陈光辉君函》，《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1号。

⑪ 恽铁樵《答某君书》，《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2号。

君书》)。对于《小说月报》上刊登的著译作品及具体编辑体例，读者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编者都给予了及时的回应和说明。

通过对《小说月报》“本社函件最录”栏目的考察，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读者与编创者自由讨论的氛围。各方坦诚地亮明立场、观点，编者真正践行了“本栏以讨论攻错为限，其一味过奖及徒事慢骂者，恕不登录”（1915年第6卷第3号）的原则，确实有效地校正了所刊小说现代转型的方向。

三 读者心目中的名家名作名刊

清末“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为提升小说地位，刺激小说编创者重视外国小说，吸引读者购阅“新小说”，对西方小说名家名著及其崇高地位进行了一系列想象性建构。晚清读者在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笼统模糊的鼓吹影响下，不仅逐渐形成了“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的功能性认知，而且在惊诧于“泰西尤隆小说学”^①、“小说为国民之魂”^②、“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福州畏庐藏板《巴黎茶花女遗事》）、“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已故前英国内阁皮根之《燕代鸣翁》（小说名）一集，其原稿之值，获一万磅。法国《朝露楼报》，发行之数，殆及百万册，然其发行之流滞，则恒视其所刊登之小说为如何”^③等域外小说“奇观”后，慢慢形成了西方文坛推崇小说、小说家多具极高地位、名家名作价值高昂、小说与报刊发行关系重大等印象。随着“小说界革命”后外国小说译介如火如荼地开展，读者的上述模糊印象更因实证而变得清晰。他们不再仅为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断肠，也了解到“法国著名文家兼天文学家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是“近世一大奇著”^④；英人德富（Defoe）众多著述中“最有大名者，即《鲁宾孙漂流记》也”^⑤；《月界旅行》为19世纪说月界者之巨擘，其作者是美国硕儒^⑥；《毒蛇圈》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⑦，“泰西之小说名家者，肩背相望，所出版亦月异而岁不同”^⑧。同时，经过近十年的建设，清末小说界亦涌现出一些本土的名家名作名刊，如梁启超创刊《新小说》并揭载《新中国未来记》等，使其成为一时风头无两的小说界领袖；林纾自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后，佳译不断，迅速成为风靡全国的翻译小说大家；吴趼人先后主持《新小说》《月月小说》等小说名刊，发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等小说名著，成为清末上海屈指可数的报人小说名家。他们的编创理论与实践已成为评者臧否的重要对象，他们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正逐日增高。

在直接追踪民初小说读者阅读反应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对名家名作名刊的评析和追捧是其核心关切。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是由清末“小说界革命”以来对西方小说名家名著及其崇高地位的想象性建构所引发，又与报刊成为小说传播的首发载体相关，其中后者更为关键。报刊这种有别于书籍的新媒体，其新闻性与市场性要求刊物及所刊小说一方面应在最短时间内抓住读者眼球，另一方面须培养一批持续购阅的忠实读者。正如法国报人 Pierre-Louis Roederer 指出的，与书本不同，报纸不是被动地等待读者去寻觅它们，而是主动地去逼近读者^⑨。为达此目的，民初众多报刊使用的普遍策略是以打造名家

①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29页。

②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12.23）。

③ 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清议报》第68册，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02.1.1）。

④ 饮冰《〈世界末日记〉译后语》，《新小说》第1年第1号，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11.14）。

⑤ 《〈鲁宾孙漂流记〉识语》，《大陆》第1号，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1902.12.9）。

⑥ 周树人《〈月界旅行〉辨言》，《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67页。

⑦ 知新室主人《〈毒蛇圈〉识语》，《新小说》第8号，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1903.10.5）。

⑧ 周桂笙《〈歌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语》，《新民丛报》第3年第7号，清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1904.10.23）。

⑨ 参见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217页。

杰作云集的名刊相号召。

清末涌现出的名家名作名刊则为民初报刊进一步以名家杰作相号召奠定了基础。例如,《小说月报》先后聘请小说名家王蕴章、恽铁樵做主编,创刊号《编辑大意》首先声明其前身是名刊《绣像小说》,并宣称:“本报各种小说皆敦请名人分门担任,材料丰富、趣味浓深。”^①《礼拜六》创刊时,主编王钝根请当红小说家周瘦鹃来做台柱子,其《〈礼拜六〉出版赘言》声称:“《礼拜六》名作如林,皆承诸小说家之惠。诸小说家夙负盛名于社会,《礼拜六》之风行,可操券也。”该杂志扉页上还曾刊登“中华小说家”林琴南、包天笑的照片(1914年第21—22期)、“小说家瘦鹃”、“画家”丁悚的合影(1914年第22期),瘦鹃的化妆照(1914年第41期),以及名家汇集的编创团队合影等^②,以此招徕读者。《小说大观》在每期封面上均大字标注“包天笑先生主任”,以这位资深名家来吸引读者。其《〈小说大观〉例言》声明:“所载小说,均当世有名文家,所有撰译,皆负责任。”当时各大报副刊聘请主笔,也以名家为尚,比如《时报》副刊主持者陈景韩、包天笑都是报人小说界的大家;《申报》社先后聘请当时名气正盛的王钝根和周瘦鹃做《自由谈》的主编;《新闻报》则自1914年起聘请文艺界新星严独鹤担任副刊主笔。民初其他大小报刊也都热衷于追求名家名作名刊效应,这成为小说界一时之潮流。

打着名家杰作招牌的报刊,自然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目光,然而是否是真的名家杰作,最终还要靠读者去裁判。总体来说,读者对报人小说家在民初十年的编创成绩多为肯定之词,从中遴选出了不少名家名作。凤兮《海上小说家漫谈》开篇即说“中国小说家,以上海为集中点,故十年以来,风靡云起,其造述译之成绩,吾人可得而言之”^③,接着便评析了民初活跃于上海的四十余位小说家及其代表作品。其评价虽自称“个人好恶从心”,但确实能反映当时一般读者看法。无独有偶,一笑《南北统一的小说家》谈到民初上海小说界的盛况,指出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等“大文豪”及其小说不仅被南方读者一致拥戴,在北方亦有很大影响^④。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被读者谈及的民初小说家有近百位,其中经常被谈到的名家就有四十余位。这四十余位作家正是《小说月报》《礼拜六》《小说大观》《小说丛报》《申报》《时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主流报刊的核心编创人员,其代表作一般也是读者心目中的杰作。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小说著译较好地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期待,标志着民初报人小说家通过富有创意的辛勤工作,在与读者的积极互动中实现了打造多元兴味阅读文化的目标。

就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民初读者对小说家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和窥探欲,追捧小说家成为一种时尚。在读者所作小说话中,经常可看到有关小说家姓名别号、容貌性情及轶闻趣事的闲谈。王锦南《小说家姓名别号表》记录了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等54位小说家的姓名别号^⑤。可怜虫《小说界的十二金钗》专门谈论别号近于女性的小说家^⑥。坤刚《小说家近事拾遗》谈了徐卓呆、严芙孙、沈禹钟等小说家的生活琐屑^⑦。有些读者还对心仪作家作种种有趣的比拟,如慕芳用二十种花来品评二十位小说家^⑧,任梦痴将周瘦鹃比拟为多啼而瘦的杜鹃(任梦痴《小说家谈屑》,《红霞》1923年第

① 《编辑大意》,《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第1期。

② 合影共11人,包括小蝶、瘦鹃、常觉、剑秋、梅郎、天虚我生、大错、钝根、丁悚、席德明、张兆琳(参见《礼拜六》1915年第38期)。

③ 凤兮《海上小说家漫评》,《申报》1921年1月23日。

④ 一笑《南北统一的小说家》,《晶报》1922年6月12日。

⑤ 王锦南《小说家姓名别号表》,《游戏世界》1922年第16期。

⑥ 可怜虫《小说界的十二金钗》,《申报》1925年5月24日。

⑦ 坤刚《小说家近事拾遗》,《游戏世界》1922年第16期。

⑧ 慕芳《文苑群芳谱》,《红玫瑰》1925年第1卷第32期。

4期)。有些读者还喜欢摘录名家名作里的隽语，并希望与其他读者分享。《申报·自由谈》就因之开设“说林拾隽”栏目登载读者摘句，让其充分表露自己的喜好和倾向。有些读者甚至还为小说家点将排名，如大胆书生《小说点将录》将近今小说名家七十余人与《水浒传》头领相比附（《红杂志》1922年第1—18号），莽书生《文坛点将录》给出108名小说家的排行榜（《金刚钻》1925年7月30日—11月24日）。上述读者的评判虽用资闲谈的小说话进行，但在当时实际形成了一种舆论力量，或大或小地影响着所谈小说家的声名。其中不少人就因之迅速提升人气，愈发成为小说界的要角。

民初读者亦喜品评名家作品。《广陵潮》在当时被读者议论最多，所谈或褒或贬。赞之者曰：“社会小说中最佳者，涵秋著之《广陵潮》，绘声绘形，无过之者”^①，“小说有诗，妙在不露牵插为上，如《广陵潮》云麟见伍晋芳晤谈诗，无意中涌出怀红珠之诗，令人拍案叫绝”^②；贬之者曰：“篇幅过长，入后逐渐松懈，较之前半部细腻熨帖，已有上下床之别”^③，“以作者于旧日之秀才社会情形甚熟，而于最近之社会情形，颇多隔膜也”^④。这些意见或就整体论，或就局部言，虽似矛盾，实为有得之见，皆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这部名著。又如谈《玉梨魂》，有的无上赞美，评它“文章凄凉，情节悲哀，读之令人泪下，洵佳构也”^⑤，“自成创格，后之作者靡然宗之”（织孙《小说话》，《十日》1922年第2期）；有的严厉斥责，认为“惟其美惟其工，益见其市侩烟火气”^⑥，“盖自四六派言情小说问世，小说之道遂受一劫”^⑦。以上读者意见至今还值得重视和思考。再如评论当红小说家的短篇作品，恽秋星评叶小凤《塔溪歌》“效为唐人小说，弥有风韵”，为言情小说之典范^⑧；豁安评周瘦鹃《一诺》“借痴情儿女之心，作救国英雄之气。……信夫其足为复活《礼拜六》开宗明义”^⑨；凤兮盛赞包天笑《富家之车》《邻家之哭声》“尤能曲写半开化社会状态，读之无不发生感想者”^⑩，是别出心裁的创新之作。这些评判颇能代表当时读者的看法。

上述读者对作品的谈论多凭一己感受发声，或褒或贬，直接明快。在重视读者反应的民初小说界，他们的意见不仅会在读者中间迅速传播，也会即时传导至编创者一端。这一方面会影响到其他读者对某部作品的评判，另一方面也为编创者调整方向、改进不足提供重要参考。

在以报人小说家为主流的民初小说界，报刊成为小说作品的首发载体，其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谈论报刊及其所刊作品也成为读者的一种时髦。请看以下两例。

其一，王钝根主编的前期《礼拜六》是民初最为风行的名刊，曾经引来不少读者为其题辞，发表阅读感受。从题辞中注明的“军次”“差次”“寄自飘城”“广东某某”“赵纫兰”等信息可知，当时争相题咏的读者来自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他们有的谈读后体验，即“如对良师，恍逢益友”（1915年第46期）；有的赞其编辑宗旨，即“补助教育、箴劝国民”（1915年第48期）；有的咏其社会功用，即贬顽订愚、维持名教（1915年第42期）、鼓舞爱国志气（1916年第100期）；有的赏其艺术效果，即娱情悦目、增进审美（参见吴东园、卢美意、方仁后、徐敏等人题辞）。这些题辞自《礼拜六》1915年第42期开始连载，至1916年《礼拜六》面临停刊之际还有不少存稿，足见当时读者题辞热情

① 汪裕先《小说派别谈》，《新世界》1925年10月20日。

② 佚名《小说诗话》，《申报》1921年7月31日。

③ 姚民哀《小说闲话》，《游戏世界》1922年第15期。

④ 冥飞等《古今小说评林》，民权出版社1919年版，第68—69页。

⑤ 澹庐《小说杂评》，《新世界》1925年1月29日。

⑥ 沈家骧《佛头着粪录》，《新月》1926年第5期。

⑦ 落华《小说小说》，《礼拜六》1921年第102期。

⑧ 恽秋星《小说闲评》，《民国日报》1919年4月7日。

⑨ 豁安《小说偶谈》，《申报》1921年7月3日。

⑩ 凤兮《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申报》1921年2月27日。

极高。为不拂读者好意，王钝根专门在最末的第100期上开设“题辞汇刊”栏目予以集中发表，并亲撰题辞以答谢。

其二，周瘦鹃是民初引领时尚的文化创意明星，他主编的报刊一经推出就会被读者热捧。有人欣赏其内容，如寒云说《半月》“选稿最精”^①，月友女士说《紫兰花片》“内中的文字，也深合我们心理”^②。有人钟爱其装帧，如逸梅说《紫兰花片》封面美人似“画里真真，呼之欲出”^③，月友女士说《紫兰花片》“装订玲珑，印刷精良，叫人见了，爱不释手”^④。有人肯定其价值，如朗如说《半月》创刊仅一年，“粤中传诵几遍，其价值盖可知”^⑤。月友女士还曾描述对《紫兰花片》的痴迷：“一等出版，便急急的赶着去买一本，从头至尾，看个仔细。等到看完了，使用着上好的香水，洒几点在书中；又取一支牙刷，蘸些胭脂汁，洒在纸上，更使这本书有香有色。”^⑥这种独特反应，让笔者不禁联想到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里说的“我们所读的是某一个版本、特定的一本，可借由其纸张的粗糙或平滑、其气味，第72页上的一小滴眼泪与封底右角落的咖啡渍痕辨认出来”^⑦。

以上两例颇具代表性，类似读者反应时见于各类“题辞”“通讯”以及小说话中。对于打着名家杰作招牌的报刊，广大读者趋之若鹜；明星作家主编的时尚杂志，则更能吸引读者“追星”。民初报刊主办者精心打造名刊、制造小说明星的意图就这样在读者的热烈回应中得到实现。

倾听上述读者声音，不仅可了解他们心目中的一些名家名作名刊，也看到了他们与编创者的良性互动。民初报人小说家本就意在打造满足各层次读者多元兴味的阅读文化，报刊编辑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读者，他们对读者阅读兴味的变化往往深有体会，能够快速捕捉和反馈。当读者的阅读期待得到确认，针对性的编创也就随之而来，这关系到某些小说类型的兴衰以及小说创作观念、小说语体及文体的变迁。可以说，正是读者与编创者一道形成了民初小说界的时代兴味，其背后则是下面要谈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四 读者所感知的小说市场

清末“小说界革命”以后，由于“新小说”与报刊出版业紧密“联姻”，市场对小说界的影响与日俱增。稿酬制度、版权立法、广告营销等都因小说市场的日趋繁荣而创生。小说出版、编辑、著译各方对这类影响的反应时见于各类文献，而读者的感知却难觅一鳞半爪。这正说明了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它对小说发展的影响在清末主要是正面的推动，而较少消极的作用。

至民初，从提供文化商品一端来看，报人小说家主倡兴味，除了凸显小说作为文学之一的审美特性外，显然还有迎合读者、占领市场之意。从文化商品消费一端来看，读者纷纷购阅报刊和小说书籍，与报人小说家积极互动，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界的持续繁荣。民初小说的空前繁荣被记录于时人笔下。1912年管达如在《说小说》中描述：“今试一游乎通都大邑之书肆，则所陈列者，十之六七，皆小说矣。又试入穷乡僻壤，则除小说外，他项书籍，殆不可得见焉。与村夫野老妇人孺子谈，彼其除小说以外无所知，无足怪也。即学士大夫，号为通知古今者，其于小说，亦复津津乐道。”^⑧ 1914年成之在《小说丛话》开篇几乎完全重复了上面的话。与此同时，报人小说家对文化市场的依赖也大大增强，毕竟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购阅者，读者需求成为其报刊定位和小说著译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

① 寒云《海上杂志评》，《晶报》1921年9月9日。

②④⑥ 月友女士《小说小说》，《申报》1923年8月26日。

③ 郑逸梅《小说杂志丛话》，《半月》1924年第3卷第20号。

⑤ 廖朗如《我的小说谈》，《半月》1923年第2卷第8号。

⑦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吴昌杰译《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页。

⑧ 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1912年第3卷第8期。

此时出现的“哀情小说”跟风式创作与《礼拜六》以“消闲”招徕读者，都是其遵循“市场法则”的体现。

众所周知，《断鸿零雁记》《玉梨魂》问世以后掀起了一股哀情小说潮。这股潮流的出现固然缘于这类小说回应了时代热点，容易引起青年读者的共鸣^①；也缘于它契合了市场需要，能为出版商赢利。在市场操控下，哀情小说创作日趋泛滥，不仅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名家的作品质量每况愈下，大量模仿之作更是粗制滥造、陈陈相因。面对这一状况，读者纷纷发出不满之声，如刘恨我认为“哀情小说大多无痛呻吟，矫柔造作”^②，落华《小说小说》指出“致以骈四俪六，浓词艳语，一如巧工之筑墙，红黑之砖，间隔以砌之，千篇一律。行见其淘汰而无人顾问”。更有读者发现这类小说在典雅精美中隐藏着市侩烟火气（《佛头着粪录》），这便直接抓住了导致其泛滥的“幕后黑手”——市场过度逐利。最终，哀情小说在众多读者的厌弃声中黯然退场。

学界对于《礼拜六》编创者重视市场效应所论甚多，可通过析读登载于该刊的“题辞”考察其对市场的利用和读者的反应。最早题辞者是时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的蒋懋熙，他高度赞扬了《礼拜六》贬顽订愚、维持名教的社会作用。发起这次题辞活动的诗文名家吴东园也数次为《礼拜六》题辞，多表推崇之意。《礼拜六》编者对这类具有极好市场效应的题辞非常重视，将其大多刊于每期目录之前。由于《礼拜六》在当时大受欢迎，加之编者积极推动，更多读者的题辞热情被激发出来。第46期天虚我生的题辞掀起了高潮，其序曰：“钝根、剑秋编《礼拜六》周刊将满五十期矣。风行海内，每期达二万册以上，一般青年于休假日手此一编，如对良师，恍逢益友，择善以从，除恶务尽，其有裨于世道人心正非浅鲜。近日政界诸公注重于通俗教育，来函奖进，日必数起。然自表面观之，殆不过拟于虞初之属，编辑者苦心孤诣或未必为局外人所共知也。爰题四绝，以供读者，并希正和。”与之唱和的众多题辞实际汇成一种声音：歌咏《礼拜六》有益于社会人心，有利于鼓舞民族志气，有效地提供审美消遣。这成为前期《礼拜六》读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这些题辞中虽有过誉之词，但结合所刊作品来看，总体符合实际。直至因“时局不靖，各处运寄不灵”及成本昂贵，本着对读者、对刊物负责的态度而停刊，《礼拜六》编者还不忘郑重声明：“一俟时局平定，商市回复，纸源不虞匮乏。当定期续出，以副爱读诸君子之雅望。”^③这一声明不仅为复刊《礼拜六》预埋了伏笔，亦体现出编创者与读者的共同期待。主编王钝根在“题辞汇刊”栏目末尾登载了《自题四绝志谢投稿题咏诸君》，其一云：“每逢沐沐尽嬉游，事到危亡转不忧。我辑群言《礼拜六》，要人孽海猛回头。”这便阐明了他编辑《礼拜六》的隐衷，表面上以消闲招徕读者，实则期待读者阅读所刊作品后识危亡、猛回头。其四云：“两载光阴悲逝水，几番国体误争棋。眼前无限沧桑感，都付周刊一百期。”其感怀时事、心系国家之情溢于言表。通过析读《礼拜六》所刊题辞，我们不难发现五四“新文学”兴起以前，即便是市场倾向较强的刊物也在坚守社会责任中努力实现着“市场法则”与“艺术法则”的平衡。

《礼拜六》在1921年3月复刊，表面上仿佛一切未变，还是原来的编创班底和相似的编刊宗旨，一样是小说市场上畅销的名刊。不过，其所处的文学场正发生着激变。当时文坛话语权之争已趋白热化，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在文学场上的权力依次上升。随着“新文学家”逐渐掌握文坛话语权，报人小说家愈发依赖文化市场。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之前较少谈及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的市场化运作至此成为焦点话题，且各方看法分歧严重。在这样的文学场中复活的《礼拜六》，事实上已开始由多元兴味向一味消闲转变，其向市场倾斜的力度正在加大。这不仅导致所刊作品整体逊色于前期，

① 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上卷，第272页。

② 刘恨我《小说小说》，《青友》1923年第11号。

③ 《中华图书馆启事》，《礼拜六》1916年第100期。

还增加了更多纯粹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广告。这便引起“新文学家”的强烈反感，为其编创者贴上了“礼拜六派”的标签，斥责他们奉行拜金主义、专作无视社会责任和国家兴亡的消闲文字。实际上，前期《礼拜六》相较于《小说月报》《小说大观》等同时期主流杂志更加“消闲”、更加市场化，但当时评者很少瞩目于此。后期《礼拜六》与同时期流行杂志《半月》《家庭》等比较，则相对“严肃”，却被“新文学家”视作拜金、消闲刊物的代表。注意到《礼拜六》前后期的微妙变化及其受到的不同评价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客观认识当时文学场的更替，也有助于正确认识读者对小说市场的不同反应。

《礼拜六》复刊的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涌现出一波新的办刊潮，各大书局纷纷加大市场投入，意图“新”“旧”文学通吃，一些小书局和个人也因编创小说杂志有利可图，纷纷卷入。由于“利”字当头，有些报刊质量就很难保证；由于要吸引眼球，必然高倡娱乐消闲，进行类型化创作，这成为这批杂志总的也是新的特点。面对日趋残酷的市场竞争，像商务印书馆这样资金雄厚的大型出版机构还可兼顾社会效益，甚至不惜改革《小说月报》；一些中小型出版机构为了生存和谋利，往往就无原则地迎合占比最大的中下层读者，做起了营养成分单一的“文化快餐”。因此，读者心父才会听到书商说现在书名取得越俗越好，内容、作者全不重要，他“再拿现在出版的书目查查，可不是都变了艳史、趣史、奇闻、奇缘这一类的东西么”^①。正如尼尔·波兹曼讨论“娱乐业时代”时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②，当时小说界也充斥着消闲风。又浅又新的消闲的确抓住了不少都市市民的文化消费心理，然而小说的审美性、思想性和教育功能等被弃之不顾，显然有害于小说的发展，也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相悖。因此，心父发出了一连串疑问：“这是书贾的不好么？是作书人的不好么？还是社会的程度无形退化么？”^③他的困惑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一些读者试图找到这种过度市场化的原因。黄贻仙说得好，出版商有根本责任，他们只求赚钱、不问好坏；小说家有责任，他们为养家糊口，只求每日“撰成数千百言”，违背了小说创作规律；读者也有责任，只是“从头到尾，念完便笑”^④。这正是玉衡所说的由市场投机心理所致^⑤。

以思想启蒙为目标的“新文学家”对小说界的过度市场化深恶痛绝，曾猛烈攻击这股“消闲风”及其背后的“拜金主义”。不过，当时读者对消闲小说持续不减的购阅热情却出乎他们意料。究其原因，小说市场自晚清以来经过不断建构已具有很大自主性，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市场法则”，当时多数读者正在完成由传统型读者向现代型文化消费者的身份转变。“新文学家”对此未能正确认识，其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也阻碍了他们听取读者的一些正确意见。

综上所述，读者反应是清末民初小说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梁启超等清末维新派正是着眼于小说拥有广大读者而倡导“小说界革命”，企图驯化野蛮生长的“稗类”以完成其政治改革的鸿业。然而，他们没有切实关注各阶层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一味宣传其政治主张，其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与缺乏“小说味”的作品很快引起读者不满。于是，“新小说家”内部要求回归小说文学本性、注重满足读者兴味的主张与实践日益高涨。辛亥革命之胜利为小说界形成多元兴味的阅读文化提供了契机，而读者与编者、作者的积极互动，为民初小说“兴味化”主潮推波助澜。如此一来，读者反应成为民初报人编创小说十分重视的风向标。他们倾听读者声音以了解其心目中的名家名作名刊及对市场的态度，并据以调整小说编创之方向，同时他们还还为这些声音提供传播平台以引导读者群体形成共同的阅读品味。遗憾的是，报人小说界在“五四”新旧文学斗争中堕入了过度市场化的泥淖，掀起了一味谋利的消闲风。这使得“新文

①③ 心父《出版界之每况愈下》，《小说日报》1922年12月5日。

② 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④ 黄贻仙《好小说哪里来呢》，《小说日报》1922年12月8日。

⑤ 玉衡《小说管窥》，《小说日报》1923年7月26日。

学家”在批判报人小说家陈旧落后之外又增加了“拜金主义”的罪名。通过以上对清末民初小说读者反应的系统考察，我们不难确认其对中国小说现代走向产生过深刻且微妙的影响。这启示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广大读者的真实反应，应该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市场的关系，从而确保当代小说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

[作者简介] 孙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发表过论文《释“兴味”》等。

(责任编辑 石 雷)

· 学术信息 ·

“第六次明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暨古典诗文的辨体与修辞专题学术研讨会”召开

2022年11月12日—13日，由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第六次明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暨古典诗文的辨体与修辞专题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19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9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明代文学文献传刻研究。叶晔（北京大学）考察了《盛明百家诗》与明别集早期版本的关系。师海军（陕西师范大学）通过李东阳集失收碑志分析明中叶士风。侯荣川（温州大学）论述明代诗话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许建业（香港树仁大学）探究日本江户时代的《唐诗选》注解本。

二、明代文学思想研究。刘洋（中国传媒大学）重审了王阳明心学思想与文学的关联方式。马昕（中国社会科学院）揭示了袁宏道文学创作与思想中的“边缘人心态”并分析其所造成的理论弊端。王润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强调集序对“后七子”文学思想建构的意义。龚宗杰（复旦大学）以杂艺为视角探讨明清文章“机法”论。

三、明代文学秩序与诗文史研究。杨遇青（西北大学）揭示杨慎诗学批评与诗史建构的双重视角。余来明（武汉大学）分享重写明代诗史的思考与理路。刘尊举（首都师范大学）展望文学史视野下八股文研究的方向与方法。汤志波（华东师范大学）认为沈周对建构吴中文坛有重要意义。郑雄（浙江师范大学）分析陆弘祚“文统说”对于建构明文统绪的价值。胡媚媚（上海外国语大学）论述明清“擅场诗”对于建构诗学秩序的作用。

四、明代文学文体研究。徐隆垚（复旦大学）分析宋元明诗学辨体的内在理路。杜欢（安徽大学）讨论明代书信的正副启形制及其书写。苗民（华侨大学）分析李梦阳别集早期版本中的杂文观。魏宏远（兰州大学）揭示王世贞《杨廷和传》以“阙疑”“考据”入传的具体方式。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龚宗杰)